

二十世紀末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本土人文 社會學者——李永熾*

薛化元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摘要

李永熾教授在 20 世紀末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原本主要扮演的是學者的啓蒙工作。特別是透過著述、教學，傳播近代自由、民主的價值，及建構台灣主體性思維。而長期對日本近代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成爲他討論台灣政治改革或是批判現實政治的思想和知識的來源。而從 1980 年代開始，李永熾教授更透過積極參與社團，甚至組織政黨，積極尋求理想的落實。在學術與政治之間，李永熾教授的政治活動，呈現強烈的理想性格。在講求現實的「工具理性」之外，堅持台灣的主體性與自由民主的「價值」，更是其政治行動的依歸。拒絕爲背離理想的現實政治背書，透過批判尋求理想的落實，是李永熾教授在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中的寫照。

關鍵詞：李永熾、台灣主體性、獨立建國

* 本文部分出處係筆者早些年與李永熾教授對談的記憶，或是觀察所得，而無出處，記憶疏漏、錯誤難免，自應由筆者負責。

壹、前言

戰後台灣政治發展，就歷史淵源來看，主要有兩個重要的側面，一個是自日治時期以來，台灣歷史的傳承；其次則是戰後由於國民政府接收台灣，自中國大陸橫的移植的歷史、文化。而在台灣政治史脈絡中，要求自由化、民主化政治改革的在野菁英份子，以及其思想傳承，也看到前述兩個側面的影響。

不過，在戰後初期扮演主要傳播自由民主思想角色的，則是以來自中國大陸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及其著作為主。之所以會有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以來，對於台灣本土菁英，也就是日治時期以來扮演追求台灣主體性以及要求台灣落實自由民主思想的地方領導階層，採取了相當程度的打壓。特別是經過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以後，台灣本土領導菁英，有些在事件，乃至其後的清鄉、掃紅中，成為受難者，有些流亡海外，更有人迫於壓力「噤聲」。縱使有意「發聲」，國民黨政府強力推動「中國化」的語言文化政策，壓制台灣本土語言及原本本土菁英所使用的日文，也使得台灣本土菁英，在意見表達及傳播上，遭到了相當的困境。在此狀況之下，台灣原本自日治時期以來追求台灣主體性或是自由民主落實的思想文化傳承，便面臨政治力介入後的斷層，或者是成為台灣歷史上的潛流。除了少數在民意機構，特別是省議會，持續提出自由民主的要求之外，在台灣文化界和媒體扮演自由民主思想傳播角色的，則是來自中國大陸知識份子所主導的，帶有自由主義傾向，或是要求自由民主主張的雜誌（薛化元，1996：3-5）。

而在國民黨政權統治台灣二十年左右，在國民黨黨國體制主導的教育成長的本土新世代菁英，逐漸有能力在中文的文化領域嶄露頭角，而帶有自由、民主思想取向的，也能在批判國民黨當局統治，要求自由民主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成為主導者。

在這個脈絡中，可以發現 1950 年代的《自由中國》雜誌，作為當時最具代表性的自由主義傾向的政論雜誌，沒有台籍的編輯委員。1960 年代

的《文星雜誌》中，雖然台籍青年有比較多的文章發表，也並非主導的角色。而在 1960 年代晚期、1970 年代初期的《大學雜誌》，社務委員中台籍菁英就佔了相當的比重。而在後續創辦的黨外代表刊物《台灣政論》、《八十年代》、《美麗島》中，戰後成長的台籍菁英則已經扮演主導的角色（李筱峰，1987：89-90；115；143-45）。

李永熾教授生於 1939 年，在國民黨當局的教育體制下成長，從學生時代接觸自由思想，對國民黨沒有好感（認同）（薛化元，2011a），最後成為批判國民黨體制，支持自由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努力建構台灣主體性¹，追求台灣獨立建國。作為台灣本土化過程中的本土人文社會學者，李永熾教授不僅見證了這個時代的發展，也是台灣主體性建構的推手之一。

本文試圖在戰後台灣史的發展脈絡中，說明個人所認識的李永熾教授。囿於能力與時間的限制，撰寫本文時，主要透過外在歷史時空條件，透過初步的訪談和筆者掌握的有限資料，進行討論。還沒有掌握、檢閱李永熾教授的論著，未能透過這些資料進行耙梳，以致仍無法釐清李教授思想的轉折，建構論著與政治實踐的論證，希望未來能再進行增補。至於 2000 年以後，台灣歷史進入另一個階段，為了避免失焦，也先存而不論，留待他日。

貳、成長的經歷與「異議」的可能

1949 年底國民黨政府自中國大陸敗逃到台灣，為了建構其統治的正當性基礎，並形塑「自由中國」的形象，以爭取以美國為主的自由民主國家的支持。在某種程度上，對於當時來自中國大陸知識份子所主導的自由民主言論，採取一定程度的容忍態度，使得這些思想主張在台灣社會有起碼的生存空間。當然，一旦這些言論觸及到批判國民黨當局存立的基礎，或者是批判反蔣介石總統，並試圖與本土菁英結合，國民黨當局便會祭出

¹ 有關台灣主體性的建構，可以參見李永熾等（2004）。

壓制的手段，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由雷震所主導的《自由中國》（薛化元，1996：173-76）。

雖然如此，在 1950 年代《自由中國》對於國民黨當局的批判以及引進自由民主思想，並成為當時台灣知識青年吸收自由民主思想的一個重要資源。至於在中國自由主義思想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胡適，由於國民黨當局對他仍然積極拉攏，藉以協助蔣介石自由民主開放的策略，並希望透過胡適的支持來建構起統治的正當性，使得胡適的主張在台灣一般的報刊媒體皆得到相對自由的傳播，特別是他的著作，也成為普遍流傳的出版品。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李永熾教授正經歷著他從中學到大學求學的生涯。

也就是在蔣介石統治時期，台灣的強人威權體制之下，囿於政治的現實，仍然容許部份異議思想的存在，而這些異議的思想也就成為知識青年吸收自由民主思想養份的重要來源。

雖然國民黨當局在某種程度上也曾經透過教育行政體系，對圖書館收藏類似《自由中國》雜誌採取較為隱密的抵制方式，如下架不使一般人輕易閱讀等等（薛化元，1996：127）。不過，在李永熾教授就讀的台中一中及台灣大學圖書館並沒有發生這樣的問題，使得李教授得以相當便利的更接觸了這些自由民主取向的知識。1955 年進入台中一中高中部以後，李永熾開始閱讀西方名著小說，特別嗜讀胡適（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99），而在當時對李永熾教授思想影響最大的是胡適（薛化元，2011a）。由於胡適的著作中往往引進西方近代民主的思潮，對於專制極權採取一定的批判態度，李永熾教授透過閱讀胡適，對國民黨也就「不感」興趣，也由於認識國民黨當局許多的作為，並不合民主憲政的價值，或是不合中華民國憲法的規範，同時又對自由民主思想採取一定的壓制手段，李永熾教授從中學時代開始，對於國民黨政權及其主張在有意無意之間已經存在著排斥的取向（薛化元，2011a）。

在這樣的狀況下，在求學期間，他當然不可能加入國民黨，縱使在入伍期間，國民黨相關人士不斷誘導、說服，他仍然沒有接受，而選擇了另外一條路線。甚至進入台灣大學歷史系任教以後，系裡國民黨的幹部也邀請他入黨，他當然一樣不願意。在一次聚會中，歷史系國民黨小組的同仁

邀請李永熾教授入黨，李永熾教授仍不肯答應。當時邀宴的歷史系資深教授還直接表示：「讓他不能夠出國研究、不能夠順利升等，他就知道了」。而出身國民黨的石錦教授，還出面緩頰，質疑說：「爲什麼所有的人都要全部進入國民黨呢？」（薛化元，2011a）至於李永熾當然沒有因此加入國民黨，繼續他黨外人士的身份。而爲了避免不必要的紛擾，他除了在教學研究上繼續努力，參加任何外面的活動絕不影響學校的教學工作。

雖然在工作上努力，不過，「異端」的行徑，仍然有被國家公權力威嚇的經驗。相較於以後因爲文字被警總注意，或是參加社會運動被警察強力「排除」²，李永熾教授留長髮，在 1970 年前後，警總主導端正風俗的行動中，便有被便衣警察在街上強制帶走理掉頭髮的經驗（薛化元，2011a）。

叁、學術研究的現實意義

李永熾教授在台灣大學就讀研究所期間，是以影響日本明治維新以降政治思想及文化界相當大的福澤諭吉作爲研究的對象。此後，他在升等教授以前的主要研究領域也都是在日本近代史範疇，然後再旁及中國近代思想史。而對於以日本爲研究重心的他而言，透過日本近代史的研究，至少產生了兩重重要的意義：首先是透過日本近代史的研究，他不僅認識到，明治維新前後，乃至其進入明治憲法制定以後的歷史發展，日本存在著不同思想流派的衝突，乃至於現實政治運作的多樣性，同時對於其他的思想流派、發展，及知識人的結社，投入政治及社會運動，也有清楚的掌握。

這些學術研究成果，不僅使李永熾教授在台灣成爲日本近代史領域的重量級學者，他在中國近代思想史領域的研究、教學，也受到學術界相當的重視。而在日本歷史學界，早在李永熾教授完成福澤諭吉研究的碩士論文，在 1968 年被台大文學院列爲文史叢刊之一出版之後，就注意到他的

² 1991 年獨台會事件發生後，李永熾參與靜坐抗議，被警方強制架上車，載離現場。當時驅離靜坐教授的報導，並不只一端。可以參見陳碧華、莊佩玲《聯合報》（1991）。

研究成果。日本慶應大學佐藤一郎教授在《史學》第四卷第一號，便以李永熾教授的《福澤諭吉社會思想之研究》作為主要對象，討論中文有關福澤諭吉的研究，呈現了他在福澤諭吉研究的史學意義（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99：484）。

透過研究，李永熾對於日本近代史上包括自由思想與保守思潮的對抗，政治路線的鬥爭，以及執政者與在野自由民主主張的互動，都有深入的掌握。這些研究在196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的台灣，本來就有現實的參考價值。這是李永熾後來將日本史的研究成果與知識，轉而提出對台灣歷史發展認識的一個重要的契機。其次，李永熾教授研究日本近代思想史，除了一般所了解的思想文人層面之外，實際上包括日本的憲政運動與憲政主張³。而這些憲政的意涵，在一般歷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固然不見得有太多的現實意義，在另一個層面上，則是成為後來他認識近代憲政意涵的知識源頭之一。對李永熾教授而言，最晚在他翻譯增田涉歷史理論的書籍時，就已經指出，歷史研究本來就是包攝了「問題意識」、「歷史意識」與「實踐意識」三個彼此相連的面向（增田涉等人，1970）。換言之，歷史研究的實踐意識取向，也就是現實意義，在他的方法論上，本來就不是問題，相對的是正常的現象。在學術研究上，他認為必須注意的，不是否定本來就應該有的「問題意識」，而是避免「問題意識」過強，導致「以論代史」，或是「問題意識」籠罩下忽略了史實的建構問題。

除了日本近代史的研究之外，李永熾教授同時也廣泛閱讀近代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相關文獻。其中德國的 Max Weber、日本的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的思想，對他有相當大的影響，這些影響不僅反映在他學術研究和教學之上，後來也成為他討論台灣政治改革或是批判現實政治的思想和知識的來源（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99：484）。如而透過 Max Weber 對議會內閣制問題的討論，李永熾教授對於直選總統，採取總統制的國家統治機關設計，便較為青睞（薛化元，2011b）。

³ 李永熾教授自在台灣大學任教以來，即以日本近代史作為主要學術專攻領域。主要著作有：李永熾（1970；1975a；1992）等書。

肆、校園及學術事務的參與與後進的培養

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李永熾教授是從校內開始的。在台灣大學歷史系擔任講師時，李永熾教授對系務便相當關心，曾經和同事七人組成「七劍」批判當時的系主任與系務。而在 1970 年代初期，李永熾教授剛自日本留學回來，在保釣前後的民族主義座談中，他也曾經應邀參與，不過由於是以日本為例子來進行座談會的發言，並沒有受到有關單位太多的注意，反倒是之前陳鼓應他們在民主主義座談會的言論引發了國民黨的不滿（薛化元，2011a），這也是後來造成台大哲學系事件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研究也持續不斷。1971 年升任副教授，1975 年升任教授（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99：485-86）。而在文學院院務方面，李永熾教授的作風也得到部分外系教授的支持，當選院務會議代表多次，積極參與院務。

而在 1970 年代末期，台灣大學的學生有不少參加了現實的政治活動，或是表示了對國民黨強烈的不滿態度。李永熾教授在此一時期，在某種程度上，對歷史系相關學生儘量採取保護的態度。如當時傳聞歷史系的學生周婉窈要到總統府去抗議，系主任孫同勛準備採取強硬的壓制手段，阻止周婉窈到總統府。鄭欽仁教授、李永熾教授都表示不以為然，李永熾回應孫同勛時表示，很多事情沒有發生又沒有確實的證據，實在不適合採取壓制的手段，而被孫同勛所接受（薛化元，2011a）。此一時期，接受李永熾指導畢業論文的大學生，包括吳密察、胡忠信等人，也私下與黨外人士有所接觸、互動，甚至協助黨外人士撰寫文宣資料等等。⁴

而在 1980 年代初期，台灣大學校內學運又再度興起，李永熾教授由於清楚的站在自由民主陣營的一方，在台大便成為當時一些學生社團如大學新聞社或從事學運的份子請益的對象，探詢有關學生運動或是自由民主理念等問題。不過，基於保護學生的考量，他並不主動鼓勵學生參加運動。而對於指導的學生，參加當時的社會運動，或是追求大學自治主張的學生

⁴ 周婉窈則是大學畢業進入碩士班後，成為李永熾教授早期指導的研究生。

運動，李永熾教授則是採取支持的態度。不過，李永熾教授對於指導的學生學術表現也相當的要求。他認為參加運動，學術研究更要做好。他對於學生的學術研究有期待，更積極用時間投入指導。在 1980 年代初期，李永熾一年只收一個研究生，並且每年針對研究生的研究主題，透過上課、指定閱讀的方式，強化學生對於研究論文研究史和方法論的瞭解。而在學生交出論文初稿之後，他先閱讀全文，再與學生逐節討論，要求修改。當學生畢業論文進入緊鑼密鼓的修改階段，每週幾乎天天與研究生討論，每次討論三、四個小時以上，也是司空見慣。並要求學生的論文達到一定的水準，才能提出口試。相對地，學生論文完成得到好評，他便積極鼓勵學生出版。

至於李永熾教授本人，在校園民主運動展開之際，則和一些比較志同道合的朋友，籌組台大內部的教授團體。台灣大學教授聯誼會成立之初，是由改革派教授發動、主導，不過隨著大量教授加入之後，原本在台大教授的生態，也就影響了聯誼會的發展。台大教授中居多數的國民黨籍教授，取得了聯誼會的主導權，透過聯誼會進行台大學術環境的改革，也遭到挫折（陳儀深，2000：143）。

而在台灣自由化、民主化改革之後，李永熾教授也參加了學術殿堂的轉型正義行動。在 1990 年代，台灣大學經校務會議決議，先後成立了楊維哲教授擔任召集人的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和黃榮村擔任召集人的四六事件調查小組（陳汝勤，2003；台灣大學，1996；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1995；台大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1997）。這兩個歷史事件的調查小組中，李永熾教授是歷史學的專家成員，用力頗多。而透過資料的蒐集與調查，台灣大學在調查報告的基礎上也完成了受難者的平反工作。就大學校園而言，這也是對於過去歷史事件做歷史清算的轉型正義的展現。

伍、筆耕與文化、論政活動

李永熾教授撰述、翻譯的殊為數相當可觀，單篇文章不計，專書政治

大學圖書館（2011）收錄了 118 筆；台灣大學圖書館（2011）則收錄了 104 筆。這些都是他筆耕的具體成果，而在早在 1977 年前後，李永熾教授在日本近代史及中國近代思想史領域之外，也開始觸及台灣史，1975 年，他發表的〈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土地問題〉是早期的期刊論文（李永熾，1975b），1977 年更出版了霧社事件的專書《不屈的山嶽——霧社事件》（李永熾，1977）。而在專業的歷史書之外，還包括了文化、文學、思想等等。而在他常常被強調的日本歷史、哲學思想、文化文學領域外，他對歐洲哲學思想、文化文學的引進也用力頗多，成果豐碩。如 Max Weber 的思想研究成果和引介，他在 1969 年翻譯了金子榮一的《韋伯的比較社會學》，是 1950 年代張漢裕教授翻譯韋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之後，國內介紹韋伯研究的先驅者。目前國內研究韋伯的青壯年學者中，在攻讀學位期間，便有人專程向李永熾教授請益。比較特別的是，李永熾教授曾經翻譯過童書（如《淘氣的尼古拉》，1978），編寫兒童讀物，這也是他陪伴女兒成長的文化產出（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99：487）。

除了勤於撰述之外，李永熾教授也與朋友共同經營牧童出版社，除了出版當時一般出版社不願意出版的學術論文之外，包括黃富三教授對台灣女工的研究（黃富三，1977）或是鄭欽仁教授的升等論文（鄭欽仁，1976）也都是在牧童出版社出版。在另一方面，牧童出版社也引進相當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史料，這些資料有一個特色，就是與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態是違背的。其中，不僅包括自由民主思想的文獻，也包括對中國文化批判，積極主張全盤西化的思想，如陳序經的專著在內（陳序經，1977）。

至於在報紙撰寫專欄，則是高信疆負責《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時候，1976 年他以北辰的筆名寫了一年多的「獻曝微言」專欄（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99：486）。由於當時帶有社會主義的批判文字，曾受到警總的注意。後來在 1980 年代金恆煒主持的《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他也應邀寫了不少文章。後來，1987 年金恆煒創辦《當代》以後，雖然沒有稿酬，縱使在積極投入社會運動以後，研究教學工作雖然繁重，他仍然持續寫作、翻譯，除了編輯之外，是這本文化雜

誌幾乎每一期至少有一篇文章的作者（薛化元，2011b）。或許這是因為李永熾教授晚上是不睡覺的，可以在夜深人靜之時，持續他的研究、閱讀及寫作。

1987年底，應《自由時報》副刊主編詹錫奎（老包）之邀，李永熾教授在自由副刊寫專欄「徒然集」（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99：489），除了文化之外，有關政治的論述也為數不少。1988年報禁解除，康寧祥籌辦《首都時報》，李永熾教授便與鄭欽仁教授成為筆陣的重要成員。報紙創刊初期，李永熾教授應邀負責文化版，規劃文化版的內容與發展方向，並固定撰寫專欄。在此期間，他提攜後進，支持學生輩規劃包括國民教育權的理論與實際的一系列專題。此後，他仍持續在報紙發表政論，以台灣南部的《台灣時報》、《台灣新聞報》和《民眾日報》為數較多（薛化元，2011b）。

而在其他政論及文化雜誌方面，李永熾教授也投入頗多。從1989年謝長廷辦《新文化》、辜寬敏辦《台灣春秋》等雜誌，他多擔任編輯顧問的工作。而投入較多，為期最長的，則老包離開《自由時報》，1993年辦《黑白新聞週刊》、《新台灣週刊》（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99：491-492），從「黑白觀點」開始，李永熾教授就長期撰寫專欄，為期數年。直到2000年民進黨執政以後，由於李永熾教授為文批評交通部有關三通課題的主張，才逐漸淡出。其次，則是台獨聯盟1992年辦《台灣評論》。李永熾教授並不是盟員，是在台教會成員廖宜恩力邀之下，才擔任總主筆的職務。在他投入較多的雜誌中，李永熾教授撰寫的文章，性質與《當代》偏重學術及文化取向不同，政治評論成為主軸。比較遺憾的是，這些政論文章相較前期以及後期的政論文章先後結集出版，大部分的文章雖然打字、排版完成，這本以「台獨最美」為名的政論集，卻因故被出版社擱置，未能問世（薛化元，2011a；2011b）。

陸、參與民主運動與結社

台灣的民主運動與黨外人士有密切的關係，而李永熾教授和黨外人士

的接觸，鄭欽仁教授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鄭教授，李永熾教授認識了當時黨外的重要人士康寧祥，以在康寧祥的《八十年代》系列雜誌開始用筆名撰寫文章介紹近代思潮。而在此之前，李永熾教授也參與了由林永豐醫師所組成的知識份子定期的聚會，透過這些聚會，也成為他認識當時台灣反對運動或是國民黨不當施政的資訊來源。並建立起一定的人際網絡。如林永豐醫師為了關心瞭解台灣的狀況，邀請許多學術界人士與關心政治的姚嘉文、張俊宏等人見面，並持續有一定的互動。1977年中壢事件發生時，相關的狀況，李永熾便是在林永豐家中聽聞到相關的訊息。而1979年美麗島事件，一開始的資訊則是來自於康寧祥找鄭欽仁、林濁水、司馬文武、李永熾等人談話時，談到這個事情。因而對於高雄美麗島事件的發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所以當校園隨後進行一大堆所謂譴責暴力簽名行動時，李永熾已經心中有數，當然準備好不參加這樣的行動(薛化元, 2011a)。相對的對美麗島事件的人士，則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對於追求台灣自由民主的政治主張也是正面支持的態度。

1980年代台灣社會政治改革的主張，國會全面改選及住民自決的主張逐漸高漲，要求台灣朝向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同時也要追求台灣主體性的認同。而這些價值對於當時投身台灣政治改革的政治人物，或是關心支持的學者來講，都是相當重要的價值取向。當時李永熾和鄭欽仁、張忠棟等歷史系的教授互動相當頻繁，至於參加正式的團體，則是1987年籌備、1988年成立的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薛化元, 2011a)。

這個基金會成立，是康寧祥協助籌措成立的基金，由學術界具有台灣主體意識的學者專家組成。成立之初的成員，除了擔任董事長的鄭欽仁教授，董事會成員中歷史學門的是李永熾教授、林明德教授、張炎憲教授、李筱峰教授，法律學門則是蔡墩銘教授、李鴻禧教授、周弘憲律師、洪貴叁律師，哲學學門趙天儀教授、劉福增教授、李日章教授，經濟學門林鐘雄教授、彭百顯教授，醫學廖運範教授、陳永興醫師，另外有數學楊維哲教授，物理學張國龍教授，教育學林玉體教授，勞動法王世榕教授等人，這在當年是台灣本土派學術菁英最大規模的組織。而在鄭欽仁董事長的邀

請下，李永熾教授負責現代學術專刊的編輯邀稿工作，同時也進行一些專書的整理和編校初稿，其中以日本久留米大學張國興教授有關戰後台灣勞動的專書最具代表性。後來，鄭欽仁教授把董事長的棒子交給李永熾教授（薛化元，2011b）。

1989年初，李永熾教授受聘為「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委員（薛化元，2011a），與葉國興等人有密切的交往。當時，這個由張榮發基金會之下的機構，具有支持李登輝總統和本土化的色彩。其後，在內部改組中，李永熾教授因為被視為強烈的親民進黨色彩而淡出。由於之前被邀請加入《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李永熾教授便與雜誌的其他編輯委員，1989年4月，共同成立學者論政團體「澄社」（陳儀深，2000：144）。這在當時被視為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團體，不過對統獨則沒有明顯傾向，後來李永熾教授因為強烈的台獨傾向而淡出。1990年李永熾教授參與組織「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與「台灣教授協會」。台灣教授成立後，李永熾擔任第一屆人文組執行委員，與執委會中的廖宜恩教授、陳儀深教授、許慶雄教授互動相當密切，對於台教會成立初期的活動投入甚多。而年輕輩的學者曾經數次邀請李永熾教授競選會長，一開始籌備台教會的年輕學者，也數次有意邀請李永熾擔任會長的職務，他沒有接受，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在於他自認對於募款工作並不內行，而這是社運團體領導人相當重要的工作（薛化元，2011a）。

而在學術團體中，李永熾教授也參加了成立於1995年台灣歷史學會，並且被推選為第一任的會長（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99：491）。而在《台灣歷史學會通訊》的創刊號，他以〈主體認識的建構與交流〉為題，揭櫫了台灣主題性導向下，在台灣的歷史學研究意義與方向（李永熾，1995）。而在以台灣為名的學術團體中，台灣歷史學會在章程中明白提出以台灣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認同，並且在新會員申請時，也特別告知此一宗旨，並強調學會是在台灣認同前述宗旨的歷史學工作者的組成。

柒、朝向台灣主體性邁進的政治參與——持續建構中

以參加台灣教授協會的籌組為契機，原本李永熾教授思想外顯的自由主義左派，或是帶有社會民主主張的色彩發生了明顯的改變。比較內斂的追求台灣獨立及建構台灣主體性的主張，更為凸顯。此後，他持續展開了對台灣自由民主言論的主張以及要求台灣獨立建國的政治路線。2008年李永熾教授出版的文集《民主與統獨論》，雖然收入了他較近期的作品，不過書名則反映了20年來李永熾教授思想的重點。整體而言，在1990年代，李永熾教授朝向台灣主體性邁進的歷程中，有兩個重要的政治參與路線。其一，參與制憲運動；其二，則是參與以台灣獨立建國為目標的政治團體（政黨）。

1991年1月，台灣教授協會、現代學術基金會和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力主制憲交公民投票。而這三個團體，李永熾教授當時投入甚深。其後，人民制憲會議在1991年和1994年前後召開兩次，李永熾教授也都積極參與。

在1991年8月24日，包括民進黨幹部、學者及社會各界代表於台大校友會館召開人民制憲會議，並對原先提出的草案進行討論（陳儀深，2000：145）。而李永熾教授和張忠棟教授原本就參加總綱草案的研擬工作，在會議中，李永熾教授和張忠棟教授推動憲法為台灣共和國憲法的初步構想。等到後來，分組會議同時召開時，總綱組的主席或召集人是張忠棟教授和施明德，不過開會時則主要由張忠棟教授主持。在會議中，包括進黨部分公職人員許榮淑立委等人不贊成直接在冠上台灣共和國，李永熾教授雖再次主張應該定名為『台灣共和國憲法』，不過許多來自民進黨的公職人員，認為太激進而不贊成，因此最後透過協調在名稱上只用了台灣而未用台灣共和國之名（薛化元，2011b）。至於草案第一條對於國名的規定問題，是否採台灣共和國原案，或是以台灣為國名，會中有所討論，8月25日以43票對20票通過草案第一條以台灣共和國為國名。這是透過會議決議方式，產生的第一部以台灣共和國為國名的憲法草案（樊嘉傑，1991）。

1994年6月25日，第二次人民自救會議（台灣人民制憲會議），才通過將憲草的名稱由『台灣憲草』更名為『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除進一步明確表達與會者獨立建國的意志外，並在第四條中明定台灣之領土為台灣本島、澎湖群島、金門、馬祖附屬島嶼及國家權力所及之其他地區，以求化解有關金馬的主權歸屬疑慮。在總統權責與公民投票方面，則規定總統得就國家重大事項依法提交公民投票，在憲法中賦予公民投票的地位。而在總統與國會的互動關係，則採取美國式總統制的規定：一方面總統成為行政首長，另一方面則規定國會對總統任命的各部會首長、大使、情治首長、參謀總長擁有同意權；而國會議員的任期為四年並規定每兩年改選二分之一，使得整體中央政府體制進一步朝向美國式總統制的方向邁進。另外對於台灣四大族群的問題，亦提出對少數族群地位更明確的保障設計。李永熾教授對於憲草中台灣主體性的進一步確立，當然是大力支持。不過身為被視為台灣社會弱勢的客家人，李永熾教授對於過分強調弱勢族群的保障深不以為然，認為在台灣獨立建國的運動上，應該強化 nation 的認同。而強調台灣國民意識，反對族群意識凌駕在國民意識之上，是李永熾教授此後建構台灣國家藍圖的基調（薛化元，2011b）。

至於在政治團體的參與上，李永熾教授從新台灣重建委員會、建國政線、建國會、建國黨的籌備、組織，一路參與。1990年施明德出獄後，1991年籌組推動新憲法、新國家和總統直選的新台灣重建委員會（1992年5月10日正式成立），老包找李永熾教授參加。當時設計的新台灣重建委員會，分為新總統、新憲法、和新社會三個部份，李永熾教授負責社會文化這個部份，新憲法是由鄭欽仁負責，而施明德自己則負責新總統這一部分。1991年底，施明德推動全島的新憲助選團（新台灣助選團），李永熾教授也積極參加（陳儀深，2000：145）。另一方面，1991年12月施明德召開「台灣建國藍圖研討會」，便積極結合年輕學者（林萬億，2006：49）。後來，林萬億教授、林忠正教授、林向愷教授逐漸成為施明德的核心幕僚，加上新台灣重建委員會改組後，原本負責的部門失去功能，李永熾便慢慢淡出了核心的工作（薛化元，2011b）。1995年9月，施明德提出台灣已經是一

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民進黨一旦執政，不必也不會宣布台灣獨立，11月又宣示要促成「大和解時代」（施明德，1995；朱鈴惠，1995）。而對1996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勝選，則主張推動大聯合政府（李欣芳，1995）。這些主張，和李永熾就受強調獨立建國的方向不同，也不合民主憲政政黨制衡的理念，故採取強烈反對的態度。大聯合政策的主要提出者游盈隆，曾經試圖遊說希望他能夠接受，而遭到他拒絕。而李永熾教授對推動獨立建國的意志，也更為堅定（薛化元，2011b）。

原本施明德被視為民進黨中台灣獨立意志比較堅定，但是此時他的立場離台獨派已經有相當距離，加上香港1997大限將屆，李永熾教授投入獨立建國運動也更積極。

1996年，彭明敏競選總統失利後，組織建國會，林山田教授擔任執行長，李永熾教授與許慶雄教授等人積極參與，但是由於決策的推動不易，便逐漸淡出，在1995年、1996年間，在葉國興等人的支持下，李永熾參與籌組建國陣線，並擔任召集人（陳儀深，2000：145-46）。1996年「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中國以飛彈試射威嚇台灣，民進黨轉向統獨大和解，對中國的威嚇表現不夠積極，李永熾教授乃與友人、社運界人士籌組政黨，以表達台灣人意志，抵制中國的文攻武嚇。」（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99：491）7月，任新政黨建國黨組黨九人小組召集人兼發言人。8月，組黨籌備會成立，任副總召集人兼發言人。10月，建國黨正式成立，任決策委員。

對李永熾而言，參加組織建國黨與其他人不同，除了是強調獨立建國的重要性與價值之外，他也認為作為一個獨立的政黨，應該要堅守政黨應有的角色與功能。因此，對於和民進黨的合作甚至因應民進黨的發展，時而要求解散建國黨或退出建國黨的行動，他便抱持著反對的態度。但是，由於主張逐漸成為黨內非主流，1999年李永熾教授便退出建國黨決策委員會（薛化元，2011b）。進入二十一世紀，李永熾教授依然堅持獨立建國的理念，強調必須以台灣主體性檢驗、監督政治人物與政黨，透過論述宣揚理念，希望早日落實理想。

參考文獻

- 台大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1997。《台大四六事件考察：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總結報告》。台北：台灣大學。
- 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編），1995。《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台北：編者印行。
- 台灣大學，1996。『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事件受害人回復名譽與教職之原則及辦法』（http://host.cc.ntu.edu.tw/sec/All_Law/5/5-61.html）（2011/10/6）。
- 台灣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2011。〈李永熾〉（http://tulips.ntu.edu.tw/search*cht/?searchtype=a&SORT=D&searcharg=%E6%9D%8E%E6%B0%B8%E7%86%BE&searchscope=5）（2011/6/5）。
- 朱鈴惠，1995。〈民進黨要促成大和解時代〉《民眾日報》11月4日，3版。
- 李永熾，1970。《日本近代化與知識份子》。台北：水牛。
- 李永熾，1975a。《日本近代思想論集》。台北：牧童。
- 李永熾，1975b。〈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土地問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8期12卷，頁40-50。
- 李永熾，1977。《不屈的山嶽—霧社事件》。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 李永熾，1992。《日本近代史研究》。新莊：稻禾。
- 李永熾，1995。〈主體認識的建構與交流〉《台灣歷史學會通訊》1期，頁1-2。
- 李永熾，2008。《民主與統獨論》。台北：前衛。
- 李永熾、李喬、莊萬壽、郭生玉，2004。《台灣主體性的建構》。淡水：群策會。
- 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99。〈李永熾教授生平大事記〉《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月旦出版。
- 李欣芳，1995。〈民進黨承諾，若勝選，將建立大聯合政府〉《自由時報》11月25日，1版。
- 李筱峰，1987。《台灣民主運動40年》。台北：自立晚報。
- 林萬億，2006。《台灣的社會福利：歷史經驗與制度分析》。台北：五南。
- 金子榮一（李永熾譯），1969。《韋伯的比較社會學》。台北：水牛。
- 政治大學圖書館，2011。〈李永熾〉（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S5*cht/?a{214373}{21465d}{214a21}/a{214373}{21465d}{214a21}/1,2,119,B/exact&FF=a{214373}{21465d}{214a21}&101,118/indexsort=-）（2011/6/5）。
- 陳汝勤，2003。〈歷史的腳蹤—台大人，談台大事〉《台大校友雙月刊》29期（<http://www.alum.ntu.edu.tw/read.php?num=29&sn=594&check=>）（2011/10/6）。
- 陳序經，1977。《中國文化的出路》。台北：牧童。

- 陳碧華、莊佩玲，1991。〈郝院長關切教授學生遊行罷課〉《聯合報》5月14日，1版。
- 陳儀深，2000。〈李永熾先生訪問紀錄〉《台灣教授協會十週年特刊》。台北：台灣教授協會。
- 黃富三，1977。《女工與台灣工業化》。台北：牧童。
- 葛西尼（李映萩譯），1986。《淘氣的尼古拉》。台北：水牛。
- 增田涉等（李永熾譯），1970。《歷史與思想》。台北：水牛。
- 鄭欽仁，1976。《北魏官僚機構研究》。台北：牧童。
- 施明德，1995。〈民進黨若執政，不必也不會宣布台獨〉《聯合報》9月15日，2版。
- 樊嘉傑，1991。〈民進黨制憲會議表決通過新憲草明列「台灣共和國」國名〉《中國時報》8月26日，7版。
- 薛化元，1996。《『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板橋：稻鄉出版社。
- 薛化元，2011a。〈李永熾教授訪談稿 20110305〉（未刊稿）。
- 薛化元，2011b。〈李永熾教授訪談稿 20110317〉（未刊稿）。

The Journey of Professor Yeng-chyh Lee on Taiwan Independence

Hua-yuan Hsueh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h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Professor Yeng-chyh Le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as a reformer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through his outstanding academic works on advocating Taiwan sovereignty. He developed his knowledge base on studying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and thoughts. From the 1980s, Professor Lee was engaged with real politics of Taiwan by participating in formation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His effort was aimed to carry out his ultimate dream of founding an independent state. The most remarkable note is Professor Lee remained himself as an idealist in all political reforms. He never compromised his plan to short-sighted plan, which should be his major legacy for Taiwan.

Keywords: Yeng-chyh Lee, sovereignty of Taiwan, Taiwan Independence